李泽厚的历程

《天涯》杂志1999年2期刊出一篇李泽厚的谈话录。90年代以来他很少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东西，读起来竟有一分故人重逢的亲切——虽然他并不认识我。

谈话录的开头是：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国外，国内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关心您的行踪和学术走向。

李：真的吗？我都怀疑你们这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何许人也。

提问者的开场白是夸张的,且带有讨好的意味(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一下子就触动了李泽厚的情绪,一种"繁华有憔悴"(阮籍《咏怀》诗句)的寂寞。这情绪颇为强烈,于是我们在后面又看到李泽厚说:"别人还告诉我,葛兆光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书目中所有人的名字(都)提到了,就是不提我的几本书。我说,不提就不提嘛,这个都无所谓的。"我们在李泽厚的新书《世纪新梦》的后记中还能看到他以嘲讽的口气说起自1989年以后,国内"汪国真的短诗、王朔的小说"以及"张中行的杂著、余秋雨的散文"的流行,和一声慨叹:"我能做的或需要我做的,大概也差不多了?!"

这寂寞大概正是始于1989年以后吧。在《世纪新梦》中意外地读到他的两个短篇散文,1990年和1992年的,很见心境。作为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的李泽厚能写颇出色的散文,知道的人大概不多,所以我们破例把它引录在后面。

而在80年代,李泽厚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出现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由政治领导层发动的和由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这两个层面有相互一致又有相互分离的地方,但在当时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后一个层面上,李泽厚无疑是重要的先驱人物。他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当然,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顾准比他尖锐,钱钟书比他博学,但70年代末顾准的东西还无法问世,钱钟书的《管锥编》虽在1979年就已出版,但那和社会迫切关心的问

题毕竟隔着一层。而李泽厚不仅在“文革”后很快接连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而且大抵是在学术研究的框架下关涉中国现实问题的发言,如《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年)、《美的历程》(1981年)以及许多单篇文章和稍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等,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了震动。我读李泽厚的新著《世纪新梦》(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看到版权页上所示那5000册的印数不禁感慨。当年李泽厚的书都是一印几万册,《美的历程》在十年光景中印了八次,是那时最畅销的书之一。现在的大学生恐怕确实有很多不知李泽厚是“何许人也”,但在80年代,至少文科大学生、研究生,枕头底下总是能翻出一本李泽厚来。

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明白。经过“文革”十年、甚至不止这十年的暴力冲刷,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语言差不多完全被权力者霸占了,这以外的东西惊人地贫乏。这种情况在短时期中很难改善。当时的年轻人虽力图挣脱这一思想语言之网,像黑洞一般不加选择地吸纳遭遇到的一切知识,但在流行的陈词滥调之外如何表述自己,依旧是个困难。这时正是李泽厚为他们开掘了新的思想源泉,提供了既非过于陌生、不可理解而又富于新鲜气息的理论思维,还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便于展开而又简洁明白的语词概念。许多人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寻找自己的路。

《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康德研究的领域具有何种地位,笔者无从说起。康德的书,据说一辈子能读懂一本就很不错,连李泽厚自己也声称他弄康德是“外行客串”。不过,这本以“康德述评”为副

题的著作在当时的主要意义,却也不在它对康德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在作者的"述评"尤其"评"中,触及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对被弄得荒谬滑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侧面进行了澄清(此书写成于1976年)。

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的一点,是他与邓小平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是对唯意志论的否定,对实践、对物质生产的重视。这大体反映着前面所说70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之间最基本的一致性。不过,当李著于1979年问世时,由政治领导层所发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关于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宣传早已轰轰烈烈过了,他的这些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当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作用。

但《批判哲学的批判》的意义本不限于上面所说的那些。首先,康德哲学被认真地对待,本身就有很重要的象征意味。1949年以来,国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关注,几乎只限于黑格尔——他的哲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来源。黑格尔哲学其实是基督教神学理性主义化的结果。奇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曾经被高度神学化,譬如命定的"历史规律"、"社会模式"论,在逻辑上除了用"神意"解说是别无办法。而一向被忽视的康德哲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现象的解释,特别在认识论方面,其实多有深微之意。重心偏向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的现代西方哲学,也是主要源于康德而非黑格尔。李泽厚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提出对康德哲学应加以扬弃改造,都包含了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的意图。同时,他的努力,实际上也具有经由康

德批判沟通西方现代哲学、使之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的作用,后来一些年轻的哲学研究者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康德研究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李泽厚建立起一个重要的概念——主体性哲学。这概念的解说很细琐,但它包含着两项明确而具有感染力的内容:人类对自身历史、个体对自身生活,都拥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李泽厚说这些是加上限制条件的。但在一贯宣扬"历史必然性"和个人根本上受外部条件支配理论的中国,"主体性"的提出有着深远意义。刘再复的文艺理论以发挥个体主体性为基点,也引起热烈的反响。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著作中传布最广的一种。李泽厚喜欢强调它的哲学性质,而一般人仍是将它当着中国艺术史来读。这是一部仅15万字光景而跨越五千年、贯通多种艺术门类的著作,它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要求它总是说得精确是不可能的,引用材料也以"大路货"居多,难免会有不够"学术"的感觉。但这样一部书在80年代初问世,谁有资格菲薄它呢?它相当完整地把一种人本意识贯穿到对中国艺术史的描述中,许多重大环节把握得透彻明白。仅以文学而言,书中谈汉赋的审美趣味、魏晋诗文与"人的觉醒"、晚明浪漫思潮等等,都从根本上打破了流行文学史的框架,给人以新异的启发且令人兴奋。并非所有观点均出于作者独创,但他确实一扫久积的陈腐,给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他的不少看法,在后来的著作中形成深长多变的延展。

除了一系列的美学论著,李泽厚还主持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方美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在 80年代启动了一场 美学热 ”。美学在西方是少数专门家的事业,在中国却一度成为时髦,这也是奇迹其中原因,正如李泽厚所说,是众多学术门类在中国都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乃至干涉,而美学虽在西方被列为哲学的分支,但在中国,它与讲究 党性 ’的哲学却是关系疏远,所以能够成为自由运用智力的游戏场所。 美学热 ’到 90年 代转入低潮。它给中国美学的发展带来多大促进,似乎也难说。中国人似乎仍是不习惯很 哲学 ’地研究美学,但它总是带来了活跃的学术气氛,也终究会在众多方面留下渗透的痕迹。

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话题进一步向中国人生活的现实状态靠近,它的内容和所谈论的人物,实际也已延伸到当代。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启蒙的取向,是科学、民主、自由、个人解放,救亡的要求是强化民族和国家意识、个人服从群体、团结一心。这两者好像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前者主要依据于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而后者则容易引起中国传统观念的复苏 实行起来,两者常是互相冲突乃至互相破坏的,这造成现代中国人极大的思想矛盾和苦恼。这话题本来敏感,加之李泽厚在 80年代末的言论与政治的关涉日渐增多,造成一部分人对他极为反感。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作为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与文化的关键之一,是不会被人们忽视的。

我们大略回顾李泽厚在 80 年代的建树,依然能够感觉到他曾是多么活跃。他的名字也许不大被人们提起了,但他确实在中近二十年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足迹。他所创立的许多

饶有意味的概念,如“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积淀”等等,也仍然以变化的形态被人们使用着。

大凡有影响的人物,都会引起些争议。提供争议的热闹,大概也算是名人对社会的一项贡献吧。而李泽厚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左派”反对他,“右派”也反对他。这里似乎反映出李泽厚的某些特点。

前面把李泽厚作为“民间知识分子”来说,这当然没有错。但他那个年辈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长期生活在浓重的政治氛围中的,而李泽厚又在50年代年纪甚轻时已经成名,这也拉近了他同政治的距离。《世纪新梦》载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谈,说及康生、周扬都曾对他表示赏识,但他躲开了。李泽厚也许真是不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笔杆子”;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给搞政治的人以一种理论指导。他的论著大都或远或近地指涉中国现实中的政治与文化问题,而基本立场大抵出于补救、纠偏,是“建设性”而非批判性的。与此相关,李泽厚的思想方法,也以多方包容和善于折衷为特点,新异、巧妙之处是常可以看到的,但并不——也许是回避——尖锐。总而言之,李泽厚素来不以“反对派”自居,思想上也极少“异端”色彩。

这也许就是李泽厚引起不同方面的反对的主要原因。政治是一种重视实效的操作行为而非理论的实践,它虽然需要理论语言来说明自己但绝不受理论的指导。在民间地位上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如果纯属“学术”、“理论”而与政治操作相隔,即使尖锐些也还可以受到容忍;相反,如果它扰乱了政治操作中的语言程序,

即使意在"建设",也仍然是触犯了忌讳,其"图谋"容易受到怀疑。而另一方面,80年代末心情烦躁而容易激动的年轻人,对李泽厚那种因为包容太多而难免暧昧的观点,又会从另一种意义上感到不满。曾经对李泽厚的著述每见必读的刘晓波,于80年代末以一部《选择的批判》对李泽厚提出挑战。这曾被人嘲笑为"仇父心理",是为了追求惊耸人心的"社会效果"(张汝伦《思想的危机》,《书林》1988年7期),而李泽厚也一直耿耿于怀,多年之后还说刘晓波"只有情绪"。这里无暇讨论其中的是非,但刘晓波的挑战受到了许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的赞同,却是笔者所见之实。

李泽厚在国内影响的淡化,当然首先是因为他在90年代初去了国外。但另一方面的事实也是:李泽厚自90年代始再也没有提出过令国内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他出国后的著述本来少,而常谈的又主要是"新儒学"问题。他把港台牟宗三等人曾轰动一时的新儒学理论不客气地指为"不过是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杂志1999年2期),又多次表示自己将建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儒学","对"新儒家"这个称号,他也表示"自己不这么说,但也不反对"的奇特的态度。而他的"新儒学",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见《世纪新梦》)。我们不知道这种理论创造首先是与国外的"吃饭"环境有关("吃饭"是李泽厚爱用的词),还是有利于国内主导意识形态的再造?但一般年轻的读书人对这场用马克思主义夺取"新儒学"阵地的战斗,不会有多大兴趣吧?

几年前,有一份叫《原道》的刊物上发表过李泽厚短短的谈话,

终了时李泽厚以宋代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与《原道》同仁们共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读书人可以说出的最为豪阔的空言。手无寸铁、寸金、寸权的读书人,在如此豪阔的空言中度日,真是不能不寂寞的。

但我们仍是高兴李泽厚把他的新著标名为《世纪新梦》,哪怕这也许真是像李泽厚说的“:日暮无时,强为欢笑云尔?”梦代表希望,而希望,无论它多么虚妄,终究是我们存活于此世间的惟一理由。

李泽厚的心灵世界

杨海文　苗凡卒

【编选说明】我们尽可能为书中所涉及的每一位“热点人物”找到一些传记性的资料,以便读者对之获得生动的印象。关于李泽厚的此类资料非常难找,他似乎不大愿意谈论个人生活方面的情形,因此,本文就显得颇为可贵。

本文作者与李泽厚是何种关系,笔者无从知晓。但就文中所涉“隐私”性内容(如李泽厚的少年恋爱故事)来看,其相当一部分资料当是出于李泽厚本人。那么,我们从文中看到的,也就不仅是作者对李泽厚的理解,也包含了李泽厚对自己的描述。换言之,这里面多少有李泽厚愿意呈示给世人的形象。

孤独、自重、感情质,是本文描写李泽厚时最突出的东西。那么,这是不是李泽厚基本的自我感觉呢?

一个哲学家有着两重精神世界，一重是他的思想的世界，这是一个冷静的、理智的、思辨的世界；一重是他的心灵世界，这是一个情感的、跳动的、直觉的世界。

哲学家袒露在人们面前的是他的思想世界，那是他最闪光的部分，也是他心甘情愿地暴露无遗的部分，他依靠它树立起了“哲学家”的形象。可是他还有那最动人的部分，按照蒙田的说法，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后屋”，这里装着他的童年、他的初恋、他的爱……装着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它以一种无形的方式产生，它不会随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它又无时无刻不冲击着读者的内心。它固然不会以单独的形态诉诸于文字，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的每部著作都会沾染一定的个人色彩，任何一部真正的哲学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哲学家自传的性质，都是他的内外阅历的折光和投射。

当你开始喜爱一位哲学家的时候，你就会渴望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当你真正喜爱一位哲学家的时候，你就能走进他的心灵世界。或许你永远也窥测不到他的曲折经历和秘而不宣的内心隐私，可是你终于会发现一个立体的、丰富的、生动的血肉之躯——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们喜欢李泽厚，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风度，喜欢像谈论一位熟悉的朋友一样谈论他。我们渴望走进他的心灵世界，也以为窥见了他的心灵世界的一隅。

李泽厚很少谈论自己，自然，人们对他的生平也就知道得很少，然而，一切又只有从他片言只字中表达出的简略生平谈起。

1930年 6月 13 日，李泽厚生于汉口。祖籍是湖南长沙。父亲是邮局高级职员，懂英语，可惜死得太早，那年他才 12 岁。从此，他的母亲，一位乡村小学教员，肩负起了抚养、教育两个孩子的重任，含辛茹苦，从牙缝里省出几个钱来供李泽厚兄弟读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托尔斯泰曾说：“一个不幸的童年，会使人受益终生。”从小康坠入困顿使他浓缩地体验了人情冷暖，少年李泽厚过早地成熟了。在他的心里，有世态炎凉的感慨，有人生如梦的喟叹，这使他变得深沉而内向，然而，贫困更多地赐给他的是一种倔强的气质，一种超越的欲望。

世事沧桑，冲淡了多少世故人情，然而母亲的那些教诲却深深地镂刻在他的内心，几十年来，一直是他奋斗不息的动力、心思灵感的源泉。

在那困窘的生活中，母亲告诫他“但求耕耘，不问收获”。这使李泽厚在年轻时博览群书，很少旁骛，生活艰难却不求功利。还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他星期天经常从岳麓山下跑到河东书店，空着肚皮，站着翻上一天书刊杂志。解放后考入北大哲学系，就一头扎进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做卡片，抄资料，深刻细致地研究谭嗣同、康有为。“文革”期间，出书无望，而他置身世外，在明港干校和地震棚里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书稿。他曾经多次写文章谈到：读书和写作应该“毁誉无动于衷，荣誉在所不计”。在一次答记者问时，他说道：“我从来不为稿费写文章，也不为名声和‘好玩’而工作。人的一生很短促，怎样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这也许是促使我写作的真正动机。”

母亲留给他的另一句话“取法乎上”，形成了李泽厚宏阔广大、纵横驰骋的思维方式，他欣赏孟子的名言：“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的好些文章架式感都十分强烈。《美的历程》跨度华夏文明五千年，横及建筑、雕刻、绘画、文学等艺术领域，是五卷本《中国美学史》写作的蓝图。三大思想史论所挑剔出来的著名思想家、突出政治事件以及再三强调的“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性”、“西体中用”……的概念、范畴、方法也无不如此。虽然他不止一次地提倡人们进行细微的研究，从小文章做起，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解决，但他却无法忘怀母亲说过

的那句话，所以，他是那么推崇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因为书中说道：“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

然而，母亲过早地去了，死时只有 40 岁，李泽厚也才 19 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如今，成名成家的李泽厚是何等一副怀念母亲的心境哟。

在 1986 年出版的《走我自己的路》里，开篇便是：“谈起我走的道路，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1984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他编辑出版了《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在序言中，他虔诚地说：“我以这本不像样子但在家乡出版的小书奉献给她——我儿子所不及见的慈祥的祖母、我亲爱的母亲宁乡陶懋栩。”

李泽厚是安泰。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旦离开了大地母亲，安泰就会失去任何力量；李泽厚呢，就不是今天的李泽厚了。

李泽厚是个孝子，然而他对母亲的情感，却不是一个“孝”字所能容纳的。对他来说，是母亲的教化引导着他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是母亲的言行伴随着他人格的生成。他对于母亲，除了天理人伦的“孝”之外，还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因为在母亲那里，他寻到了自己的根。不仅是李泽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父母都是他们的第一位导师。雨果每当母亲的生日，都要献上一首发自肺腑的诗篇。名震世界的美国汽车大王艾柯卡在他的自传中用了大量笔墨说起他的父母，他之所以要出任埃利斯岛自由女神像百年纪念委员会主席，是因为父母常对他讲起埃利斯岛，“这是我父母所希望的，我是出于对他们的爱”。

父母死得早，李泽厚很小便成了孤儿。

孤儿，大都痛苦、感伤、困惑和性格内向，这种外在的孤独会更早地引发内在的孤独感。日本最伟大的文学家，亚洲东部惟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到他十三四岁时，祖母、爸爸、妈妈、姐姐、祖父先后离开了人世。他成了孤儿，孤儿生活中特有的寂

寞、孤独，使他走进了文学世界，拿起了笔，写自己，写《16岁日记》、《拾骨》、《参加葬礼的人》、《致父母的信》。

现代心理学表明，孤独感与人类文化创造息息相关，川端康成孤独，没有亲人，是日本杰出的文学大师；康德孤独，终生不娶，成为德国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孤独，常年居住在海边悬崖上的一间小屋里，远离人类文明，建立了他博大深沉的哲学体系；李泽厚也孤独。

李泽厚孤独，大概是因为父母早逝，家境贫寒，而且个性极强。他坦率地说：十四五岁时，就经常带着忧伤与感慨，写新诗和小说，模仿艾青、艾芜，也填“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之类的词。小时候，他很怕出去作客，这种心境延至今日，他不喜欢文山会海，经常逃避。也懒于给别人写信，要写就短短几行，以陈明大事为标准。

不要以为孤独者便不再渴望感情，相反会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内在、深沉。在他12岁时，他就曾为一个十分动人的哲学问题而苦恼，他想到了死，他想到人最终也逃不脱一死，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支配着他“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看着明亮的风景,惶惑不已”。

他终于没有“废书”，更没有死，他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对人间的爱。在读大学的时候，为了支援父母双亡的堂妹读书，他每天用盐刷牙，省下几元助学金寄给她。这不是怜悯，因为怜悯是富人的品质。他很穷，他的财富是他的爱。

在那个感伤的认真的孤独的少年时代，他还爱上了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她倔强、冰冷、美丽。他俩同班。他喜欢邀她放学一起回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李泽厚把一枚纸制的戒指戴在表姐的手指上。她戴了一会，取下了。两人相对无言，内向的性格使李泽厚不能表白自己的爱慕。

在人群中孤独，那么他会把自己的感情倾向书本，倾向自然。

李泽厚热爱大自然，数十年前的靳江湘水，依然纠缠着他的情思。他多么向往那一垅垅金黄色的油菜花，和那漫山遍野开得热情亢奋的映山红。今天，他回想起湖南老家，总是感慨万千。他在湖南只生活了十多年，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最长的在靳江、长沙的居住，也不过 8 年，比起在北京度过的 37 个年头，短多了。然而，1986 年,《湖南日报》约他写的《故园小忆》,短短不盈千字,可那情哟,要多浓，便有多浓；要多深，便有多深。“纷至沓来的回忆和思念使我伤感而困惑。”是最精彩的一笔。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在《论孤独》中说：“人们为了逃避孤独而离开人群，走向自然或者过独居生活。”的确，孤独者越是在噪杂喧闹的地方越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一旦进入自然，就立刻会与周围的一切，小桥流水、帆影孤灯或大漠风沙产生强烈的认同。

坎坷的人生、动荡的阅历塑就了孤独的李泽厚。也正是孤独使他体会得那么深沉、内在，近乎一种严肃的美。孤独感为他提供了一间“后屋”，让心灵在这里宁静，让角色化了的因而是被限制被改装了的李泽厚在这里成为非角色化的自由的真正的李泽厚，孤独美，带给他的不是后现代主义那种所谓的荒谬与所谓的孤独，而是带来了丰富的感性体验，带来了真正的理性证明，带来强烈的创造欲望和灵感。

孤独是感伤的，也正因为感伤而认真，李泽厚是真诚的，有时还显得那样偏执，没有情感。

到成都去，他宁愿游览被人们冷落了的王建墓，而不想光顾已变得有点儿珠光宝气和挂满了名人字画的杜甫草堂。他说：“我宁肯欣赏一个真正的历史废墟，而不愿抬高任何仿制的古董。”

鲁迅是他最崇拜的人。少年时代，鲁迅和冰心是他的精神导师。冰心的小说散文给他灌输了童挚真诚的爱，温暖了他格外敏感的幼小心灵。鲁迅的文章则教会了他如何冷静地对待人生。而

且鲁迅的性格、气质、风骨更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痕，那就是刚强、正直、感伤、困惑、孤独。

他是那样推崇鲁迅，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他曾不遗余力地评价过鲁迅的思想、人格和对整个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在他为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作的序中，曾把鲁迅和《红楼梦》并列为中国社会的两面镜子。然而，他对鲁迅的态度却极其客观，讲究科学性，不为情感所左右。他不仅对“鲁迅论中医”不以为然，也不因为鲁迅写过矿物学的文章，进过医学院，谈论过政治，教育过儿童，就把他尊为矿物学家、医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在另一个原则问题上，他更是坚持自己的见解，不把鲁迅当作哲学家看待，自然，他有他的理由。他就是这样，强烈的情感伴随着冷静的理智。

他深深地爱着美学，绝不容忍人们对美学的随意“发展”，如把美学当作标签不负责任地到处乱贴，提出什么“爱情美学”之类。认为对生活、人生和自然的美，只有哲学的沉思，才能窥视、认识、把握。庸俗化了的美学，实际上就是不要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要对生活美、人生美、社会美进行“有距离”的观照，才是美学的真正目的。

李泽厚既有细腻的情感，又有冷峻的理智，这是矛盾，但并不费解。这一切源于他的真诚。一个真诚的学者就不会掩饰这种矛盾,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的人，他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鼻祖，他的全部思想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这一基本判断之上，他提倡竞争，赞赏经济领域的优胜劣汰；然而，他同时又是同情主义伦理学派的创始人,提倡仁爱、慈善、同情、利他。

人情的逻辑不是理论上的逻辑，理论上的二律背反在生活中不一定全是悖论。水与火，同存于世，是真实的；理智与情感，在一个人身上重重叠叠，击撞出火星，是真实的。

李泽厚，不是一个做作的人。

他真诚地希望年轻人胜过自己。因为他对时间、生命、存在、人生之谜等有着深切的感受。早在 12 岁时，他就为生死观念所困扰，曾废书弃学几天。朱光潜先生的死，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意义："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复"；"只有记忆和感情将以更丰富的形状活在人们的心底，而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类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1978 年，他的《美学论集》问世，面对几十年的笔耕硕果，他并不惊喜，而是怅然喟叹："呜呼，朝华易逝，转瞬中年，董此旧编，益增怀想。"所以他寄希望于青年，"愿颂民主之春风，望宏文于来哲"。正是怀着这一悲壮的幽情，他喜欢和年轻人对话。他也常常直言年轻人的不足，然而很少嘲笑和鄙夷，多的是善意的批评。他尤其欣赏年轻人"破天下达尊"的开创精神，也欣赏他们新的研究方式。他给刘笑敢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体系及庄学演变》作的序，就非常赞赏刘笑敢把计算机处理技术带进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方法。在这篇序中，他不无感慨地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大概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了。'然而'结论不应是'悲乎'，而该是'不亦乐乎''，显现出一位开放的殷殷前辈的胸怀。

（《随笔》1989 年第 2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